

跨学科视角下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 脉络、方法与前景*

蒋芳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信任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但也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点,各学科关于其定义、分类、作用、度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信任问题的主要研究脉络,评述了各学科关于信任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与主要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从跨学科视角探索推进国际信任理论创新之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了目前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提出了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主要议题。

关键词:信任;跨学科视角;理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国际信任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4.02.02

一、引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大国间战略博弈加剧,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骤增,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国际政界、学界、媒体界已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国家之间增强互信对于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信任”及其相关词汇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各国领导人言论和媒体报道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多次在各个国际舞台上反复强调,各国领袖应收窄分歧,重建互信,增强社会凝聚力,捍卫多边体制,带领世界人民实现共同目标。^[1]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国家间信任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5年访问

美国、2016年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中美应增强战略互信。^[2]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致辞中曾鲜明指出,“日益突出的‘信任赤字’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亟需破解的‘四大赤字’之一。”^[3]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赴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以及会见古巴、塞尔维亚、澳大利亚等多国领导人期间,更是屡次表达了中国愿与各方增进政治互信、密切战略沟通和协作、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强烈愿望。^[4]

然而,信任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难点。各学科关于信任的定义、分类、作用、度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尚在继续,国家之间究竟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提升国际信誉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3CGJ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3-11-12

作者简介:蒋芳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亚太区域合作、中美关系、国际信任与合作理论。

如何建立、维持、增强、修复信任至今仍是一个理论和现实难题。在这一背景下,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脉络,充分借鉴、融合不同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与主要分析方法,努力探索推进国际信任理论创新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将试图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信任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和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归纳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目前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主要议题,以期为学界今后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切实增强中外互信与合作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二、社会科学谱系中的“信任”

信任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古典政治学和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都曾受到过关注,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主流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才分别开始将信任问题作为专门的课题进行理论研究。随后,信任问题陆续得到了组织管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关注,并在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入国际问题研究者的视野。

社会学对信任问题的关注始于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5]一书中,齐美尔(Georg Simmel)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之间的普遍信任,社会将走向瓦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了解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信任,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长久……现代生活更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信任之上……”^[6]自20世纪50年代起,主流社会学开始围绕信任的定义、来源、分类、功能、影响因素等内容展开了较深、较广的研究,切入视角和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不少学者通过实验或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社会中人际信任的普遍存在性和程度差异性,也有一些研究从社会资本、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文化内部的信任程

度差异。^[7]尤其是社会学中对个体层面“特殊信任”与社会层面“一般信任”的区分为各学科更加深入地阐释和研究信任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心理学家多伊奇(Morton Deutsch)是心理学领域较早关注信任问题的学者。他提倡从探讨冲突的解决中思考信任,指出:“人对某件事的信任是指他期待这件事的出现,并相应地采取某种行为,这种行为结果与其预期相反时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大于与预期相符时给其带来的正面心理影响。”^[8]此后,赖兹曼(L.S. Wrightsman)、罗宾森(S. Robinson)等一批心理学家都对信任的内涵、形成过程、变化机制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9]例如,萨波尔(Charles F. Sabel)在《习得的信任:不稳定经济中建立新形式的合作》一文中批判了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学社会理论对于经济关系中信任建立的宿命论观点,认为信任不一定是基于个性或社会性的特征,政府通过在主要经济参与者之间发起煽动性讨论有可能促进相互不信任的经济参与者之间的集体认同,有利于他们重新创造“共同历史”,从而为创造相互信任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途径。^[10]萨波尔的这项研究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统治者与信任网络的研究^[11]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论证了统治者(政府)对于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影响,也为我们理解霸权国/崛起国在国际信任关系中的特殊重要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经济学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2]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出版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才开始专门针对信任的内涵、功能、形成机制等问题开展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13]经济学家们尝试将信任问题与博弈论、信号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风险决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相结合,并且更加注重将信任与合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其他学科的信任问题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国际信任理论研究的

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组织管理学也很早便开始关注信任问题。与经济学略有区别的是,组织管理学更侧重于研究信任对于企业行为和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模式的影响,例如信任因素如何影响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合作状况等。^[14]尽管国家之间的信任与个人和企业层面的信任有很大区别,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国际信任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国际关系领域对信任问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15]西方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理论学派都极少涉及对信任问题的直接探讨,甚至存在将国家间的“不信任”常量化或将信任与合作等量齐观的简化倾向。^[16]直到冷战结束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才出现一些专门针对信任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开始迅速发展,颇具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例如,德波拉·拉森(Deborah Larson)、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布莱恩·罗斯本(Brain C. Rathbun)等学者在批判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学派的基础上,尝试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信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家之间的信任建立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17]近年来,信任问题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之一,并得到越来越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除了研究信任问题本身以外,对话语层面的信任^[18]、敌对国家/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信任^[19]、信任与冲突/合作/竞争的关系^[20]等都有了更多关注。

尽管信任问题引起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但不同学科对“信任”的理解和阐释却十分迥异。例如,社会学通常将信任理解为一种与人类行动相关联的社会关系现象和复杂社会运行的简化机制;心理学将信任看作一种与预期、信念、情感、认知相关的人类心理状态;经济学一般将信任视为人类在收益与风险的博弈中,基于对利益和风险进行计算的一种理性选择;国际关系学则将

信任视为一种影响国家间合作、竞争或冲突状态的主观因素或条件。^[21]而且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信任的定义也千差万别。仅笔者目光所及的文献中,信任的定义就有不下百种。整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信任的理解和定义方式大致有四种类型:

一是将信任视为一种预期、期待、信心或信念。例如,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认为信任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习得的一种对他者的预期。^[22]哈丁(Russell Hardin)认为信任是对某人或某机构寄予期望的信心。^[23]罗宾森(S. Robinson)认为,个体之间的信任无非是一种期待、预期或信念,一旦产生信任,行为体会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善意的、有利的,或者至少不会对自身利益带来损害。^[24]郑也夫认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25]二是在第一种定义的基础上引入“三方关系”或“具体行为”,即A信任B会做C。例如,侯斯默(L. T. Hosmer)认为信任是一种对于什么应该做的行为预期,这种行为和决策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26]霍夫曼(Aaron M. Hoffman)认为信任是行为体自愿将自身利益置于其他行为体的控制之下,并相信其他行为体会避免以有害的方式使用它们的自主权。^[27]基德(Andrew H. Kydd)则将信任定义为“认为另一方愿意合作,而不是利用合作的信念”。^[28]

三是从风险的角度来定义信任。例如,科尔曼(James C. Coleman)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行为,是行为体在对信任风险和收益进行权衡以后的理性市场决策行为。^[29]达斯和滕斌圣(T. K. Das and Binsheng Teng)认为信任是风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30]蒂利(Charles Tilly)将其定义为“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31]

四是从信任的功能来理解这一概念。例如,阿罗(Kenneth J. Arrow)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含蓄的契约和难以购买的商品。^[32]赫希(F. Hirsch)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物品。^[33]卢曼(Niklas Luh-

mann)在阐释信任时也强调,信任是一种人类面对社会复杂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简化机制,是“知”与“无知”的融合。^[34]

总之,在整个社会科学谱系中,“信任”的内涵和定义尚无定论,不同学科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也各有侧重。但这恰恰反映了信任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高度相关性。正因如此,信任问题才能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获得多个学科的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为我们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国际信任问题创造了更多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信任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与基本路径

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信任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社会心理学以及综合/分析折中主义三种研究路径,并主要涉及三个维度的议题:一是从理性选择角度或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信任的来源/建立/功能/类型;二是对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系统信任(System Trust)与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区分;三是对信任/不信任与合作/冲突之间关系的理论探析。^[35]

(一)理性主义研究路径

经济学所崇尚的理性主义研究路径是目前信任理论研究中主流的研究路径之一。这一路径遵循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信任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行为体经过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结果。^{[29][36]}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理性主义研究路径主要关注第一和第三维度的议题,并形成了理性选择、博弈论和风险决策这三种主要切入视角。

1. 理性选择视角。肯尼斯·艾罗(Kenneth Arrow)是较早从理性选择视角研究信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阐释了信任的重要性及其所蕴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后人研究信任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37]作为理性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哈丁(Russell Hardin)和科尔曼(James C. Coleman)虽学科背景不同,但他们都从理性选

择的角度论证了潜藏利益和可信性计算对于信任形成的重要性,探讨了信任的来源以及行为体如何做出信任决策。^{[29][38][39]}哈丁认为,信任关系本质上属于一种利益关系,对于得失的盘算是决定行为体信任与否与信任程度的标尺,行为体之间的潜藏利益(Encapsulated Interest)激励互动双方决定选择信任与值得信任,才使得市场交换活动能够有条不紊地持续下去。^{[38][39]}科尔曼则认为,行为体在做出信任行为之前需要进行理性计算,不仅需要评估信任对象是否值得信任,还需要考察外部环境是否支持信任对象做出被预期的行动。^[29]

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研究国家间信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较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学科对于信任研究的一种互鉴与融合。然而,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艾罗的研究并未深入探讨行为体究竟如何做出信任决策以及在行为体之间如何建立和维持信任,因此理论深度仍然有限。其次,在这些研究中,信任主要被当做是一种功利性、有目的性的决策行为,而事实上这种工具性的理性信任仅是信任最低程度的表现,要达到高水平的合作可能恰恰应当超越这种工具理性信任。再次,尽管信任与利益息息相关,但潜藏利益的存在并不能确保行为体之间一定能够产生和维持信任,且行为体对利益得失的盘算和偏好排序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仅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国家间信任仍是远远不够的。单纯依靠双边利益机制来建立和维持信任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并不一定有效。例如,如今中美之间的利益关联度远远高于21世纪初期,但美国可能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比21世纪初的中国更值得信任。此外,哈丁认为是值得信任,而不是信任构成了社会合作与和谐的基础。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值得信任本身并不能单独存在,它与信任相辅相成,是一方或双方对对方的信任创造并激发了对方的值得信任,而后才有了双方的合作。^[40]

对于应对复杂交易与合作行为中的信任问题,经济学家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从交易成本经济学出发,指出行为体既存在预期理性而

实践有限理性的一面,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还有为了追逐私利而充满狡诈、欺骗的另一面,因此可采用第三方保障和专用性资产投资、抵押物交换等激励性安排来建立和维持信任机制,降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信任成本。^[41]威廉森的研究指出了信任关系的产生和维持需要内部和外部保障,这对国际信任理论研究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然而,这也容易使我们陷入另一种悖论:如果行为体都需要持续花费高昂的物质成本和制度成本来建立和维护信任,这究竟是体现了它们之间的信任,还是这恰恰意味着它们之间互不信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第三方或制度能够真正避免行为体之间背叛的可能性,那么他们之间的合作便倾向于成为一种确定性,信任的功能是否已大大降低?

2. 博弈论视角。博弈论不仅可以演绎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对“成本—收益”的考量,也为人们如何基于这种对利益的计算结果采取行动提供了线索,因此也有不少学者将博弈论引入信任理论研究中。

博弈论中最经典的模式是“囚徒困境”(又称标准博弈,Standard Game)。^[42]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囚徒困境可以这么解释:由于行为体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合作难以建立,因此招认对双方来说都是占优策略。在其基础上,森(A.K.Sen)进一步探讨了“有保证的博弈”(Assurance Game),指出改变报偿结果的关键是行为体之间存在“双方都不招”的约定,因为这使得“你不招我也不招”成为每个行为体排在第一位的偏好选择。^[43]但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双方都需要对方的保证,需要相信对方也会做出自己期望的选择。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则基于对“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下合作问题的探讨,指出行为体之间长期互惠关系的存在和“一报还一报”策略不仅可以改变囚徒困境的报偿结果,使行为体之间建立合作,还能够保证合作得以维持和进化。在这一过程中,信任、友谊和预见性都不是必要的。^[44]

1990年,大卫·克雷普斯(David Kreps)提出了简

单而经典的“信任博弈”(Trust Game)(如图1所示),^[45]并指出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纳什均衡是委托人选择不信任,而代理人选择欺骗,最终结果无法实现两人总体利益的最大化。要使双方走出困境,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过引入法律机制来增加代理人的违约成本;二是确保博弈是重复的,通过强化信誉机制、促进交易关系的长期化来实现合作;三是通过感情培育改变参与者偏好。^{[45][46]}在此基础上,伯格(Joyce Berg)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信任的“投资博弈”(Investment Game)。^[47]它与信任博弈最大的区别在于,A和B将进行多次重复博弈,每一轮A都将决定对B“投资”多少信任,而B每一轮都需决定对A的信任反馈多少“回报”。伯格等人通过这一实验证明,人们不仅会在博弈过程中对被信任方的信任行为予以奖励,也会对他们的背叛行为进行惩罚,即便这种惩罚对信任方来说成本很高。他们建议,当我们在考虑如何利用制度引导人们建立持续的互惠关系时,需要认识到这种正面和负面“互惠”的同时存在。^[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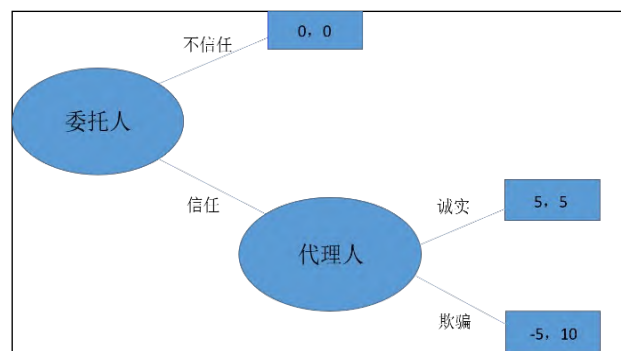


图1 克雷普斯信任博弈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克雷普斯的研究自制而成

尽管囚徒困境(标准博弈)已在学界得到广泛运用,但其最大缺陷在于假定行为体之间是没有信任、没有交流、也不存在长期互惠关系的陌生人,因此“背叛”总是占优策略。“有保证的博弈”“重复博弈”和“再确认博弈”虽然都存在将信任与合作混淆的问题,但它们都弥补了标准博弈的固有缺陷,强调了成本、信号、关系持续性以及“一报还一报”策略对于国家间建立信任和维持合作的重要性。然而,阿克塞尔罗德对个体差异性和信任

的忽视决定了这一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48]信任博弈和投资博弈的进步在于它们将信任行为与合作行为进行了区分。但信任博弈最大的缺陷在于,A与B是一种非对称的单向信任关系(委托与代理),因此主要是B的行为决定了报偿结果,对于A来说没有最优策略。投资博弈暗示了A和B的长期互动过程将使得A对B的信任程度和双方的合作水平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对国际信任理论研究有很大启发。然而,投资博弈仍未讨论A和B两个行为体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变化对合作状态的影响,因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49]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是创造性地将博弈论引入国际信任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在其专著《国际关系中的信任与不信任》和其它几篇相关论文中,基德以理性选择理论和贝叶斯均衡理论为基础,将“再确认博弈论”(Reassurance Game Theory)与信号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并与安全困境理论、恐惧的螺旋等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清晰地阐述了信号和互动对于追求安全的国家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作用。^[50]基德的研究也引起了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和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专家蒙哥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的进一步讨论。唐世平认为,再确认不是结果而是手段,是一种策略,向对方发送“再确认”的信号必须要建立在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蒙哥马利承认再确认在国际社会中较为罕见,而且不太可能成功,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都不愿意真心暴露自己的偏好。他认为较小的姿态并不可靠,但是军事上的再确认又十分冒险,因此这种信号很有可能会削弱自己。^[51]

3. 风险决策视角。近年来,风险决策视角在信任理论研究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然而,学界对于信任与风险关系的解释仍存在一些争议。例如,一些学者从信任产生的条件出发,认为人们只有在合作中面临风险的时候才需要信任。^{[29][52]}也有学者认为信任他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风险。^{[10][11]}还有学者认为信任与风险两者相

伴而生,信任决策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决策。^[30]

在诸多从风险决策视角研究信任的成果中,达斯和滕斌圣(T.K.Das and Bing-Sheng Teng)的研究较为值得关注。他们将信任倾向(Trust Propensity)区分为“意愿信任”(Good-will Trust)和能力信任(Competence Trust),即信任包含对被信任方良好意愿和具备采取期望行为能力的信任,并进一步将这两种信任倾向分别对应“关系风险”(Relational Risk)和“绩效风险”(Competence Risk)。他们认为,主观信任是对风险的一种认知,行为信任是在认知风险后的一种风险承担,人们的主观信任和对风险的感知就像彼此的镜像,两者相伴而生,因此信任也可以被理解为风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30]

此外,严进在《信任与合作——决策与行动的视角》中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信任关系中的风险管理问题。他认为,可通过关系运作和契约管理来共同管理信任所带来的风险。保持良好的关系意味着保持双方充分的信息了解和共同的利益基础,这可以大大降低对方背叛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契约为代表的制度安排能够在管理信任风险的同时,为更长远的互动合作提供平台,从而促进信任的建立和发展。^[53]

整体而言,风险决策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信任背后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一是大部分从风险决策视角看待信任的国外学者都对信任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对信任与风险的理解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而言,风险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结果(尤其是损失)的变化;二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即各种可能性的存在。^[54]而信任正是行为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即便认识到了风险的存在,仍然愿意承担信任带来的风险,且相信这一行为可以提供更好结果、并得到另一方珍视的一种积极心理预期。^[27]二是既有文献对于究竟“风险是信任的先驱(Antecedent)”,还是“风险是信任的结果(Outcome)”,或者“信任与风险相伴相生”仍模糊不清。因此,仅从风险决策的视角研究信

任,很有可能会陷入循环论证或自相矛盾的困境。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研究路径为我们理解信任背后的理性因素提供了重要借鉴。尤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利益的信任关系在国际社会中难以维系,国家之间潜藏利益的存在、重复博弈中双方高成本善意信号的传递为国家间信任与合作的建立、维持和增强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一路径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造成对信任的“工具化”理解。事实上,信任或者不信任本身它并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或随时抛弃的工具,而是行为体在面临风险时自然形成的一种心理预期或心理状态。这种心理预期可能存在工具性的一面,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包含行为体的主观认知和情感等因素。不仅如此,理性主义分析视角下的信任仅仅是外界刺激-行为体反应的结果,是一种行为选择的附带品。这种理解事实上并未提供更多知识上的增量,也忽视了行为体之间的个体差异。事实上,行为体有差异化的信任经历、互动历史、个体特征、所处的制度环境等都会造成不同个体之间信任程度的差异,因此仅用理性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国际信任问题仍然是不够的。

(二)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

社会经济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发展了波兰尼(K·Polanyi)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指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潜入社会关系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社会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并不一定源于理性选择,也可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此仅仅靠理性主义分析方法并不能充分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55]格兰诺维特这种对于“忽略非理性动机”的批判,恰恰印证了理性主义研究路径的固有缺陷和社会心理学路径对于信任研究的重要性。

相较于理性主义研究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更多被运用于探讨第一、二维度的议题,尤其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制度、群体、认同、认知、情绪等因素对信任的影响。例如,卢曼在其代表作

《信任与权力》中指出,信任是一种“复杂社会运行的简化机制”,其功能在于增加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34]若要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人们必须信任。^[34]原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强调,信任处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奖惩,依赖于人们对制度和法理的信服、敬畏和遵从。^[25]莎娜·科什娜通过借鉴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因“恐惧心理”造成的不信任是内战持续很长时间而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这种恐惧心理使得内战参与各方都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非常消极,因此在没有足够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愿轻易接受政治解决方案。^[56]另外,祖克尔对三种信任类型的划分^[57]、尤斯拉纳提出的“道德信任”^[58]和什托姆普卡提出的“信任文化”^[59]、蒂利对“信任网络”的论述^[11]、尹继武对情绪与认知相互作用及其对信任影响的探讨^[60]等,也都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信任的理解。

对于人际信任/特殊信任与系统信任/一般信任的区分是社会心理学路径下信任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例如,卢曼、什托姆普卡、周怡等学者都探讨了一般信任/系统信任的重要性,认为一般信任/系统信任可以成为一种联结人心的力量,为社会秩序的整合提供一种文化基础,并认为系统信任最终将取代人际信任/特殊信任。^{[34][59][61]}这与祖克尔提出的制度信任将取代基于特征和互动的信任有相通之处。^[57]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斯本(Brain C. Rathbun)则将社会心理学关于“一般信任”研究成果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从“一般信任”的角度反驳了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对于国际制度可以使国家之间从不信任走向信任的论述,指出是国家间的“一般信任”,而不是国家间的“不信任”推动了国际合作和多边国际组织的建立。^[62]他认为,战略信任/理性信任本质上是情境性的,是任何特定时间特定利益集合的产物;而一般信任是一种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一种社会资本。对多边主义的推崇是国家间存在一般信任的表现,不信任会导致国家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63]

还有不少学者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视角切入,运用社会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社会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与信任的关系。例如,雅辛斯基从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视角指出国内政府的治理水平将决定国内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是否充足,从而决定该国是否更倾向于将周边国家视为敌人,甚至引发国际冲突。^[64]福山通过对比东亚国家和欧美国家之间的一般信任水平后指出,儒家文化主导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普遍属于低信任社会,而基督教文化主导的欧美发达国家则属于高信任社会。^[65]库克和山岸俊男则尝试结合博弈论和社会心理学分析路径,指出美国人的风险偏好要强于日本人,从而导致他们的信任决策偏好和一般信任水平都有明显差异。^[66]杨宜音等学者则通过研究中国社会中的信任问题,提出了“自己人”概念,认为中国人是将他人包容进自己的自我边界之内而形成信任边界的。她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信任是通过拟亲化亲缘关系和个体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两个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来实现的;“自己人”身份的获得是“外人”获取信任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国人可以因爱或需要将外人纳为自己人,也可能因恨或排斥将亲人、熟人贬为外人。^[67]李伟民和梁玉成也指出,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属于关系本位取向的特殊信任,但实质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关系中互动双方心理情感上的亲密认同。^[68]

综上所述,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看到了“信任”中的“非理性”因素,强调了信任的“社会性”和“情绪性”特点,从而弥补了理性主义研究路径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事实上,信任的这种社会性和情绪性不仅会影响到行为体的认知和理性计算,也会进一步影响其行为。对行为体社会性和情绪性的重视是区别信任与一般理性计算的关键所在。正如大卫·刘易斯(J. David Lewis)等学者所说,“如果去除信任中的所有情感因素,那么信任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预测和理性的风险计算,就像军事演习的结局,其唯一的逻辑就是自身的

利益和死亡的比例。”^[69]其次,这一研究方法对一般信任/系统信任和特殊信任/人际信任的区分以及对“信任文化”的重视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对国际信任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纯粹社会性、情绪性的信任也是几乎不存在的,脱离共同利益基础和行为体理性计算的信任关系也不足以促使国家间建立、维持和增强合作。因此,仅从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来研究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也是不够的。

(三)综合/分析折中主义研究路径

在借鉴和结合理性主义与社会心理学两种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有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尝试结合这两种研究路径对国家间的信任与不信任、冲突与合作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并逐渐开辟了更加适用于国际问题领域的第三种研究路径——综合路径(也称“分析折中主义”研究路径)。

霍夫曼(Aaron M. Hoffman)的《信任建立——克服国际冲突中的怀疑》一书以及他的两篇学术论文《国际关系中信任的概念化》《信任关系的结构性原因:为何对手无法一步一步地克服怀疑?》可谓是较好运用这一研究路径的里程碑式著作。^[69]霍夫曼指出,信任是一种出于利己主义的行为,否则行为体没有理由要将重要之物委托给他人;但信任也可以是行为体的情绪所产生的一种态度,而不纯粹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27][70]}他将信任的主要来源分为学习、身份认同和制度。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依据历史经验中所得到的信息来对其他国家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加工,帮助他们理解特定的政策安排;当国家认为彼此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时,双方更容易信任对方;制度安排可以防止和约束搭便车和欺骗等行为,从而有助于使国家之间建立相处的规则和监督机制。由于统治者在进行信任决策时需同时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风险,因此只有通过建立一种“双刃制度”(Double-edged Institution)来消除这种双重风险,才有可能使国家在国际合作与冲突中建立信

任。^[70]毋庸置疑,霍夫曼的研究对于理解国家间的形成及其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他的研究也并非无懈可击。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三种信任来源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界限不清、逻辑不明的问题,因此他在对各个理论视角进行具体分析时,容易出现重叠。例如,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对历史上制度和身份认同过程的学习,因此历史经验对国家建立信任关系的影响,也可能涉及到身份认同和制度问题。

德波拉·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在《不信任的剖析: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一书中,从理性选择、国内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心理因素三个不同方面阐述了美苏之间的不信任是如何产生的。她指出,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是一次错失的机会,即双方本能达成信任与合作。如果怀疑只是基于利益,那么就没有失去过重大机会,对对方动机和意图的错误知觉是信任难以形成的根源,而这种心理上的怀疑主要是因为信息与之前的经验不对称。无论是威权政府还是民主政体都可能通过夸大其他国家的威胁来增强国内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种行为将导致国家之间的不信任。^[71]此外,拉森认为合作的实现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作为基础,信任的建立必须从小范围合作互惠逐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合作,这一观点与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提出的逐步回报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72]

另外,西方还有不少学者运用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国际组织中的信任问题。例如,由约安尼斯·利阿诺斯(Ioannis Lianos)和奥基欧格翰·奥杜杜(Okeoghene Odudu)共同编著的《在欧盟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管制服务贸易:信任、不信任与经济一体化》一书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区域一体化的视角探讨了信任与不信任如何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作者强调,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信任水平决定了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 Based Trust)和系统信任(System Trust)水平的提高对于提高区域

内的一般信任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一体化理论应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而以“信任一体化理论”(Trust Theory of Integration)代之。^[73]伦敦大学贝尔津什博士(Christopher Andrejs Berzins)在其博士论文《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难题: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中的风险与关系管理》中运用综合分析方法对多边国际组织中的信任生成与维持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国家决策者需同时进行风险管理和关系管理两方面的工作,既需确保本国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也需努力促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目标、制度和价值。^[74]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也运用综合路径对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例如,刘毅和陈瑶都在反驳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认为国家崛起与外部信任构建过程不具有兼容性等观点的基础上,分别从“关系本位”和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探究了国家崛起与信任同向展开的可能性。^[75]黄海涛以分析折中主义为认识论基础,提出了综合理性选择和社会心理学两种研究路径的“信任决策”分析视角,认为信任门槛本质上主要基于理性评估,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评估对象除了现实战略利益外,也包括由社会互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非理性因素所框定的可信度。^[76]此外,王正在其专著《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中从地缘政治、历史沿革、空间政治等视角出发,有效结合了理性主义与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对世界政治中的信任与不信任进行了深入阐释,并从信任理论角度分析了塞浦路斯问题的起源以及国际社会为解决该问题做出的努力。^[77]

综上所述,综合研究路径已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这一路径最大的优点在于有利于从学理上打破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界限,通过创造性地借鉴与融合理性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两种研究路径,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的分析视角来推进国际信任理论研究。但由于这一路径对研究者本身的研究能力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相比于前两种研究路径,其科

学性和系统性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学界运用综合分析方法研究信任问题的理论成果仍相对较少。

四、国际信任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发展前景

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发现,不同学科之间对于信任的理解和研究思路差异非常大,社会科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理论研究从整体来看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78]除了少数学者的研究有一些交叉学科的特点,大部分研究基本都因受到了学科限制而展现出“各说各话”,甚至相互排斥、彼此对立的状态。

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跨学科视角下推进国际信任理论研究更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比不同社会、群体、个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也更加复杂,它既非纯粹的经济或社会或心理问题,也不是单一视角所能充分解释的,因此其他学科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难以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积极引入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视角,尝试运用并不断完善理性主义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是推进国际信任理论研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历来将“重信守义”“重义轻利”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信义文化渊远流长。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展国际信任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史料和素材。同时,相较于历史上其他崛起大国,中国崛起具有更加深刻、丰富的内涵,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秩序现状也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79]这也有利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断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中探求理论研究的突破点和生长点,在结合中国历史经验与当前国际关系实际的基础上,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学派进行反思、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新研究范式,为国际信任理论研究的推进贡献中国智慧。

然而,当前我国国际信任理论研究虽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

处。一是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仍相对边缘,较具系统性、理论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仍屈指可数。二是信任常常只是被当作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减少国际冲突的一种手段而被提及,针对信任问题本身及其与国家间合作、冲突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仍不充分,且目前学界对“不信任与冲突”的研究明显多于对“信任与合作”的研究。三是大部分研究都专注于阐释信任这一概念或研究“国家之间信任/不信任的原因”,但对于国家应建立哪种信任、如何建立、增强和修复信任、如何处理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缺乏足够关注和深入研究。四是大部分文献都只从国家层面论及双边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对区域层面和整个国际社会系统性“一般信任”的关注都相对较少,因此在研究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单一性和片面性。

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国际信任理论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真正做到“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相关研究成果,跨越不同分析路径之间的鸿沟,开展真正符合中国历史经验与国际关系实际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仍任重道远。具体说来,笔者认为未来至少有以下重要议题值得学界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1. 国家间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2. 对国家间信任程度及其变化的判断标准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3. 信任与权力、制度、利益、文化等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转化机制;4. 不同信任类型的形成条件、相互作用与转化机制;5. 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6. 盟国之间、敌对国家之间,以及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建立、增强和修复互信的路径;7. 信任因素对国家战略调整和对外政策行为选择的影响;8. 国际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如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建立、维持和增强机制;信任因素对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影响等;9. 国际舆论战与话语层面的信任问题,如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崛起国在话语层面的信任;崛起国如何在国际舆论战的背景下构建和提升国际社会对其在话语层面的信任等;10. 国际信誉问题,

如国际信誉与国家间信任之间的关系;国际信誉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崛起大国提升自身国际信誉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等。

总之,信任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议题。随着越来越多学科和研究者在信任理论研究上有所贡献,相信这一问题未来也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国际关系领域对信任问题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但也展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积极尝试结合中国经验、从更加综合多元的跨学科视角推进国际信任理论研究,在借鉴融合其他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开拓出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国际信任理论研究范式,既有利于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也可为进一步为增强中外互信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切实方案和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1]UN News. “Restore trust and inspire hope, UN chief says in message to UNGA76” [EB/OL].(2021-09-21)[2023-05-14]<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news/restore-trust-and-inspire-hope-un-chief-says-message-unga76>;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calls for renewal of social contract in new report” [EB/OL]. [2022-05-14]<https://unric.org/en/secretary-general-calls-for-renewal-of-social-contract-in-new-report/>.
- [2]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EB/OL]. (2015-09-25) [2023-05-14]http://www.gov.cn/xinwen/2015-09/25/content_2938968.htm; 中新网. 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EB/OL]. (2016-06-06) [2023-05-14]<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6/06-06/7895532.shtml>.

- [3]中国外交部.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 [EB/OL]. (2019-03-29) [2023-05-14]<https://www.fmprc.gov.cn/ce/cemr/chn/zgywt1648532.htm>.
- [4]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 [EB/OL]. (2023-07-04) [2023-11-10]<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tent6889888.htm>; 人民网. 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正能量 [EB/OL]. (2023-08-24) [2023-11-10]<http://hb.people.com.cn/n2/2023/0824/c19406340543046.html>; 中国青年报. 习近平分别会见古巴总理、塞尔维亚总理、澳大利亚总理、南非副总统 [EB/OL]. 第01版 (2023-11-07) [2023-11-10]https://zqb.cyol.com/html/2023-11/07/nw.D110000zgqnb_20231107_2-01.htm.
- [5]《货币哲学》最早于1900年出版,笔者未找到最初版本的原著,因此本文主要是参考1978年英文版。参见: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M]. London: Routledge, 1978.
- [6]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M]. London: Routledge, 1978: 178-179; Simmel, Georg, K.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Simmel* [M].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0: 313-386.
- [7]R.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R.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J].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95: 28 (4): 664-683; R.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Kenneth Newton.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1, 22 (2): 201-214; Michael P. Jasinski. *Social Trust, Anarch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Francis Fukuyama.

-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5.
- [8] Morton Deutsch. Trust and Suspicion[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4): 265-279.
- [9] L. S. Wrightsma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Attitudes Toward Human Nature,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and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1: 373-412; S. Robinson. Trust and the Breach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4): 574-599.
- [10] Charles F. Sabel. Studied Trust: Build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in a Volatile Economy[J]. Human Relations, 1993, 46(9): 1133-1170.
- [11] Charles Tilly. Trust and Rul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文版参见: [美]查尔斯·蒂利. 信任与统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12] 《道德情操论》最早于1759年出版, 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再版。亚当·斯密在书中提到, 在人类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中,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但其观点当时并未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参见: [英]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蒋自强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3] [美]加里·S·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王业宇、陈琪,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Roderick M. Kramer. Organizational Trust: A Reade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5] Vincent Charles Keating and Jan Ruzicka. Going Global: Trust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2015, 5(1): 8-26.
- [16] 刘毅. 国家崛起与信任状态: 一项研究议程[J]. 太平洋学报, 2014(2): 24-33; 王正. 信任的探索: 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M]. 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 2017.
- [17] Deborah W.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Aaron M. Hoffman,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 [18] Johanna Vuorelma. Trust as a Narrative: Representing Turkey in Wester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Haukkala, van der Wetering, and Vuorelma, eds.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t, and Psychological[M]. Oxon: Routledge, 2018: 37-56. Philipp Brugger. Trust as a Discours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Strategy - First Results from a Study on German Trust in the USA[J].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2015, 5(1): 78-100.
- [19] Nicholas J. Wheeler. Trusting Enem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teve Chan. Trust and Distrus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M].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7; 黄海涛. 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2): 128-151.
- [20] Ken Booth and Nicholas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rian C.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rew H. Kydd. Trust, Reassurance, and Cooperation[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4, 54(2): 325-357.
- [21] 蒋芳菲, 王玉主. 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J]. 太平洋学报 2019(12): 15-30.

- [22] Bernard Barber.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3] Russell Hardin. *Concep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rust*. In Karen S.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3-39.
- [24] S. Robinson. *Trust and the Breach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4): 574-599.
- [25] 郑也夫. *信任论*[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5: 14、71、99-108.
- [26] L. T. Hosmer. *Trust: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2): 379-403、71、99-108.
- [27] Aaron M. Hoffman.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8(3): 375-401.
- [28] Andrew H. Kydd. *Trust, Reassurance, and Cooperation*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4, 54(2): 325-357.
- [29] James C. Coleman.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0] T. K. Das and Binsheng Teng. *The Risk-Based View of Trust: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4, 19(1): 85-116、101.
- [31] [美] 查尔斯·蒂利. *信任与统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5、96-99.
- [32] Kenneth J. Arrow. *The Role of Securities i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isk-Bear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1964): 91-96.
- [33] F.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78-79.
- [34] Niklas Luhmann. *Trust and Power*[M]. Cambridge: Polity, 2017: 1-40.
- [35] Zhou Yi. *State-society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Farmers' City, in Wenzhou the Early Reform Er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1): 476-498、1-2.
- [36] Oliver E. 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1993, 34: 453-502; Russell Hardin. *The Street-level Epistemology of Trust*[J]. *Politics and Society*, 1992, 21: 505-529.
- [37] 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M].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4.
- [38] Russell Hardin. *The Street-level Epistemology of Trust*[J]. *Politics Society*. 1992, 21: 505-529.
- [39] Russell Hardin.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
- [40] Toshio Yamagishi. *Trust as a form of social intelligence*. In Karen S. Cook, e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Series on Trust Vol.2. Trust in society*[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121-147; Toshio Yamagishi, Karen S. Cook, and Motoki Watabe. *Uncertainty, Trust, and Commitment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104(1): 165-194.
- [41] 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22): 233-261. Oliver E. 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1993(34): 453-502.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 [42] Michael Taylor. *Anarchy and Cooperation*[M]. New York, Wiley, 1976. Robert M.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4.
- [43] A.K. Sen. *Choice, Orderings and Morality*[M]. in S. Korner e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4. Reprinted in his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 [44] Robert M.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4. Robert

- Axelrod, and William D. Hamilt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 *Science*, 1981(211):1390-1396;
- Robert Axelrod and D. Dion. 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 *Science*, 1988(242):1385-1390.
- [45]D. Kreps. 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6]张维迎. 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 *经济研究*, 2002(1):3-13.
- [47]Joyce Berg. John Dickhaut, and Kevin McCabe,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5, 10:122-142.
- [48]Diego Gambetta. "Can We Trust Trust?" in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1988:225-229.
- [49]Karen Cook and Toshio Yamagishi, et al. 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 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5,68(2):121-142.
- [50]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rew H. Kydd. 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J]. *World Politics*, April 1997, 49(3):371-400; Andrew H. Kydd. Trust, Reassurance and Coopera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2000, 54(2):325-357.
- [51]Tang Shiping and Evan Braden Montgomery. Uncertainty and Re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7, 32(1):193-200.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6, 31(2):151-185.
- [52]Morton Deutsch. Trust and Suspicion[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4):265-279.
- [53]严进. 信任与合作——决策与行动的视角[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7:217-218.
- [54]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Handbook of the Fundamentals of Financial Decision[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3:99-127.
- [55]Mark Granovetter. *Society and Economy: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481-510; Mark Granovetter.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M]. in Mauro Guillén, Randal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35-59.
- [56]Shanna Kirschner. *Trust and Fear in Civil Wars: Ending Intrastate Conflicts*[M]. Lexington Books, 2014.
- [57]G. Lynne Zucker.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6, 8:53-111.
- [58]Eric M. Uslaner.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rus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ric M. Uslaner.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Trust[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0(115):569-590.
- [59][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 程胜利, 译, 中华书局, 2005:160-184.
- [60]尹继武.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77.
- [61]周怡. 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秩序——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J]. *社会科学*, 2013(6):58-69.
- [62]Brian C.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1]第二条) Brian C. Rathbun. Before Hegemony: Generalized Trust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J]. In-

- 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1, 65 (2) : 243-273; Brian C. Rathbun. The “Magnificent Fraud”: Trus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Hidden Domestic Politics of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after World War II[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1, (55)1: 1-21.
- [63] Brian C.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M]. 2012: 2.
- [64] Michael P. Jasinski. Social Trust, Anarch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 [65]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 [66] Karen Cook and Toshio Yamagishi, et al.. 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 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5, 68 (2): 121-142.
- [67] 杨宜音. “自己人”: 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1999(2): 40-54.
- [68] 李伟民, 梁玉成.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 社会学研究, 2002(3): 11-12.
- [69] J. David Lewis, Poland Oregon, and Andrew Weigert.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J]. Social Forces, 1985, 63(4): 967-985.
- [70] Aaron M. Hoffman. Building Trust: 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aron M. Hoffman.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Trusting Relationships: Why Rivals Do Not Overcome Suspicion Step by Step?[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7, 122(2): 287-312.
- [71] Deborah Welch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2] Charles Osgood. Suggestions for Winning the Real War with Communism[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9, 3(4): 295-325.
- [73] Ioannis Lianos and Okeoghene Odudu, eds. Regulating Trade in Services in the EU and the WTO: Trust, Distrust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74] Christopher Andrejs Berzins. The Puzzle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sk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June 2004.
- [75] 刘毅. 国家崛起与信任状态: 一项研究议程[J]. 太平洋学报, 2014(2): 24-33; 陈瑶.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0): 102-132.
- [76] 黄海涛. 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2): 128-151.
- [77] 王正. 信任的求索: 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M]. 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 2017.
- [78] 蒋芳菲.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赤字”: 演变与动因[J]. 当代亚太, 2022(6): 64-97.
- [79] [美] 约翰·伊肯伯里. 中国的崛起: 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 载《中国崛起: 理论与政策的视角》[M]. (朱锋, [美] 罗伯特·罗斯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39; 蒋芳菲.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美国对华“对冲战略”演变[J]. 美国研究, 2018(4): 75-96.



包广将 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主任,入选福建省C类人才项目;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2016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东南亚国际问题及区域国别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研究》《史学月刊》《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等期刊;编著《国际关系理论文选》;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办青年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办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子课题等多个省级国家级项目。研究方向:东南亚国际关系。



蒋芳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系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当代亚太》《美国研究》《国际问题研究》East Asian Affairs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20余篇中外文学术论文;在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等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4部英文学术译著;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参与撰写多篇决策咨询报告并多次获得国家主要领导和省部级领导批示。个人首部学术专著《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于2023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曾代表中国参加“2018年中日韩青年峰会”并荣获韩国外交部颁发的“最佳代表奖”;2021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研究方向:亚太区域合作、中美关系、国际信任与合作理论。